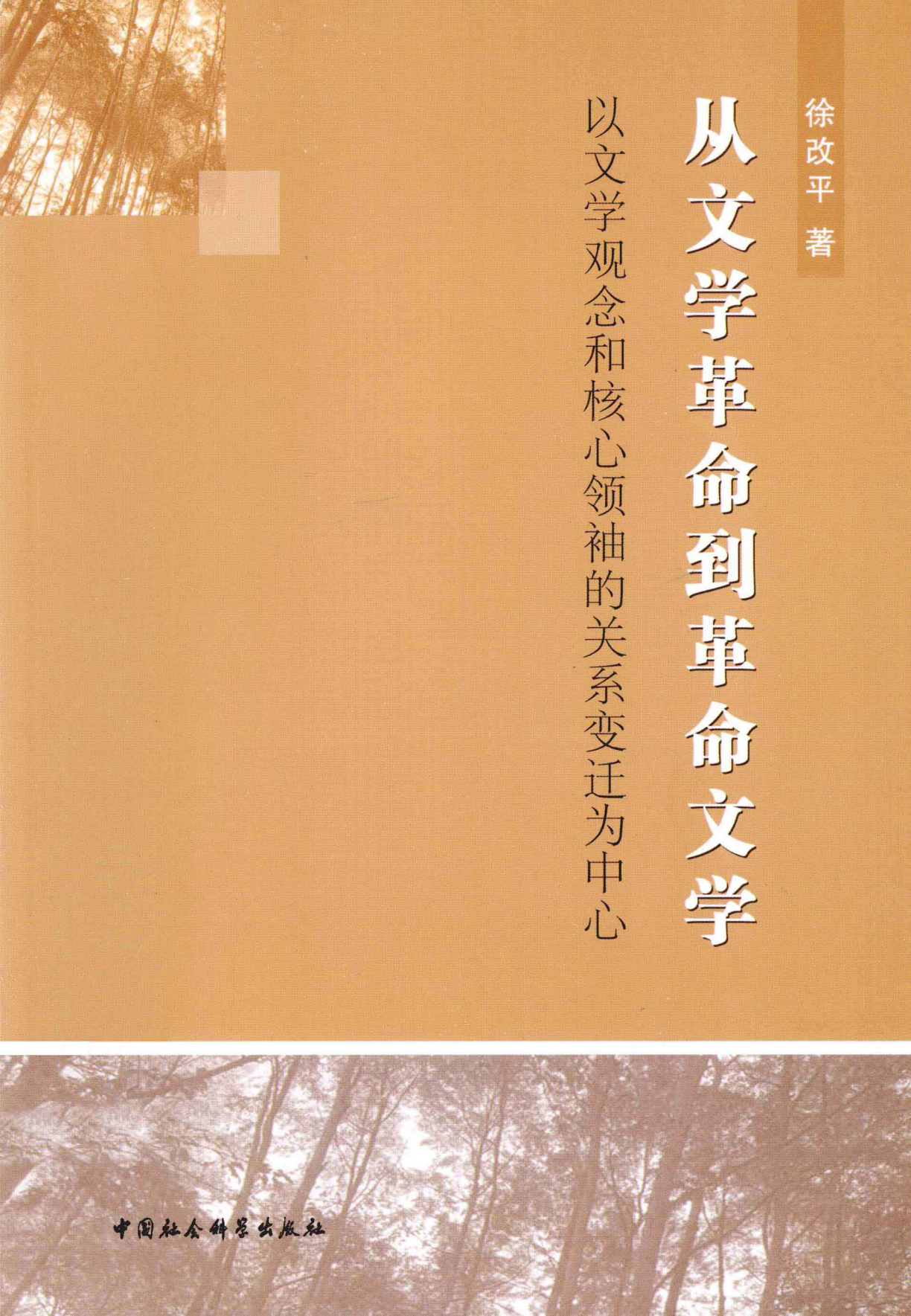




徐改平 著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以文学观念和核心领袖的关系变迁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洪业平 著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以文学观念和核心领袖的关系变迁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文学观念和核心领袖的关系变迁为中心/
徐改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2189-4

I. ①从…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46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编 从文学倡导者的观念变迁看新文学的转变

第一章	胡适新文学理论再评价	(3)
第二章	陈独秀新文学观念的演变	(27)
第三章	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	(40)
第四章	新文学运动中的刘半农	(49)
第五章	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以《中国青年》 为中心	(58)
第六章	从混沌多元走向明确单一:略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之路	(80)

下编 胡适鲁迅比较论

第七章	“学”随“术”变的当代传统 ——以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为例	(99)
第八章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	(119)
第九章	由并肩作战到渐次疏离:《新青年》转向后的胡适 与鲁迅	(132)
第十章	突出重围的艰辛与讲学议政的困窘 ——20年代后半期的鲁迅与胡适	(147)
第十一章	共产党的同路人与国民党的同路人 ——略论晚年的鲁迅与胡适	(180)

附录

一	谈《胡适全集》误收的一篇文章	(201)
二	陈独秀编著过《革命文学史》吗	(205)

三 鲁迅与梅兰芳	(212)
参考书目	(227)
后记	(230)

上 编

**从文学倡导者的观念变迁
看新文学的转变**

第一章 胡适新文学理论再评价

胡适的文学理论，还在初创阶段，就被老朋友梅光迪鄙夷为从欧美新潮流那里拾得的余唾，后来，梁实秋指实是美国意象派影响了胡适，持此论者还有闻一多，朱自清，方志彤，王润华，王锦厚，陈希^①，由于具体语境的关系，他们的出发点不可能相同，但在忽视胡适本人思想发展历程上却基本一致，这是从理论源头上对胡适文学理论的批评。也有人针对胡适文学理论本身进行批评，就在新文学诞生不久，就有人直指胡适是诗歌的罪人，创造社诸位先表此意，后来时不时也有人表示同道。1949年以后，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多数认定，胡适的文学理论，是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革新，谈不上革命性的变革，纯属卑之，无甚高论。不过，当初陈独秀在接到安徽留美学生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信的时候，却说此信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希望胡适“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文学改良刍议》就由此信催生，该文在《新青年》发表后，北大教授钱玄同说：“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那么，胡适的文学理论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又该如何评价呢？在新文学已然有近百年历史的今天，回首新文学初创期的情形，其实是一桩有意味的工作。

事实上，一切新创，都有一个传统的起点，这才是常态。作为新文学开山者的胡适，也不例外，他的求学初阶基本是中国传统教育。在读私塾

^① 王小林：《胡适与美国意象派》，《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第28卷第3期。

时，胡适就已涉猎了《诗经》这部中国古典诗歌最早的选本，也背熟了《律诗六抄》之类的律诗选本^①，闲暇时还阅读了大量的白话小说。这里的小说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由下列胡适自己列举的书目就可推断：《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以上为白话长篇小说）；《琵琶记》（元代南戏）；《双珠凤》（长篇弹词）；《经国美谈》（日本政治小说）；《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以上为清无名氏编写之讲史）。就这部分胡适回想起来的书目而言，通俗文学占相当大的比重。弹词自不必说，它是流行于南方诸省的一种说唱文学。三部所谓讲史，是有清以来因袭宋元话本创作的余绪，也属于市民文学的范畴。几部白话长篇小说虽然在今天属于经典著作之列，在当时却属通俗之列。《正德皇帝下江南》、《粉妆楼》、《七剑十三侠》这类时人与今人都界定为通俗小说的作品，胡适也翻阅过。自然，胡适也读了些文言小说，不仅有代表作《聊斋志异》，还有仿《聊斋志异》的《夜谈随录》，以及清末笔记体小说《夜雨秋灯录》等。《聊斋志异》虽是文言小说，其中还杂有不少方言的成分，但其所写鬼神狐仙之流，情状颇类人间，很是吸引少年胡适。他读后，用白话讲给家族大院里的女眷听，给她们孤寂的日子多了些许色彩，她们不仅用美食来表达对小小少年的疼爱，更亲切地称呼他“麋先生”，这些宠爱让少年胡适初步体验到了读书给他带来的认可，进一步激发了他的读书热情。更重要的是，以白话作品为主的广泛阅读，使胡适发出“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②的感慨。到上海读书后，他接触到对当时中国最具冲击力的进化论思想，被梁启超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所吸引，萌发了日后做学问的种子。自命新人物的胡适，在中国公学编辑《竞业旬报》时，不但把自己长期阅读白话的经验运用到了编辑这份报纸的工作中，试着用白话写文章，还萌发了不作与世道无关之文字的念头——“文以载道”的观念只要有合适的土壤，随时就能在中国读书人的心里萌发，就胡适当时的实践来说，他也并不感到用白话写体现《竞业旬报》主张的“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是

① 胡适不仅熟读了其父胡传特地为他编写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和《原名》，而且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也略有涉猎。

②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多么困难的事情^①。

赴美留学之初^②，因为学农学的关系，胡适一度决心疏远文学，曾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文科书籍分送给友人。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未停止对文学知识的吸取，读中学时已初步接触英诗，有过将其翻译成汉诗经历的胡适，对英语世界乃至整个西方的文明有敞开接受的胸怀。他收藏了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主编的《哈佛丛书》（收集古今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经典，共五十一卷包括132种著作，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丛书”之称），以备随时查看。从胡适日记可知，他事实上更多阅读的还是这套丛书中的文学作品。戏剧方面：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他初来时就开始阅读了。索福库勒斯的《俄底浦斯王》、果戈理的《警察总监》先后也进入他的视野。散文方面：主要阅读了培根、爱默生、蓝波的散文，阿迪生和斯蒂尔的《旁观报》论文集也让胡适爱不释手，反复提及。诗歌方面：主要有济慈、歌德、密尔顿、华兹华斯和白朗宁等人的诗，以及德文的《抒情歌谣集》。小说方面：胡适阅读了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小说，大仲马的《侠隐记》（续），还读了些俄国短篇小说。中国的文学书籍大致有《左传》、《古诗十九首》、《水浒传》、《临川集》（王安石）、《诗经》、《欧堂日记》（周星誉）、谢灵运诗、陶渊明诗、杜诗、《老子》等。这仅是1911年1月30日到10月30日期间，由胡适日记中记录下来的所读书目，看来他的阅读是相当广泛的。1912年转入文学院以后，胡适的阅读量大，也试着去了解美国文艺界的新潮流，韦莲司女士的新派绘画他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却通过了解，欣赏并感染到对方勇于挑战俗世的勇气。广泛地了解中西文艺，促使胡适有意识地思考一些问题。当他在1915年8月3日读到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时，就敏感地意识到：“此文学史上极有关系之文也”，并进而以文学所表现的内容与表现方法之不同将文学分为“理想主义”（idealism）与“实际主义”（realism）两类^③。从此，胡适对于文学理论颇多关注：8月4日，他写下了对白居易写景诗的认识，认为其特色在于“真率”与“详

① 徐改平：《胡适早期诗文创作论》，《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② 在1917年6月1日写的诗《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觀庄》中，胡适写道：“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就很形象地描述了其留学之初的情形。

③ 《胡适留学日记》（3），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25—726页。

尽”^①；8月9日，把王安石认为文学之目的在于“根柢济用”的话记录在日记，没有进一步评价^②；到了8月18日，对王安石，白居易等代表的“实际家之言”就发出了质疑，“然文学之优劣，果在其能‘济用’与否乎？作为文词者，果必有所讽乎？”胡适引用《诗经》序言中的经典名句，来纠正这些“实际家”的偏颇，接着，就阐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他从文学之目的入手，将文学分作两类：“有所为而为之者”、“无所为而为之者”，指出：“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③这个看似折中的方案表明，当胡适有意识地思考中国文学的问题时，有着强烈的融合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意图，他不满于狭隘的“文以载道”说，试图从中国文学最早的经典《诗经》序中寻求纠偏根据，并据此衡量后来者，认为白居易抹倒一切无所讽喻诗的做法“殊失之隘”，更可贵的是，他还意识到自己早年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的想法，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需要注意的是，“兼两美”的想法，在胡适以后的文章中将以前不同的说辞出现，有时候他在“两美”中难免也有所倾向，但融合二美的总基调基本不变。自然，此时的胡适对于文学问题还只是大处着眼，对文学的一般规律有所心得。

二

1915年的夏季，对胡适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不仅完成了哲学思想上的一大飞跃^④，对文学问题也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假期中，梅光迪、任鸿隽、胡适、杨杏佛等聚首绮色佳。这几位朋友都是南社社员，其中梅光迪和任鸿隽还是读书会会员^⑤，他们谈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便是中国文学问题，讨论中，胡适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即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方有可能重新焕发出光彩。此前，在为中国学生会成立的“文学科学研究

① 《胡适留学日记》（3），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28页。

② 同上书，第736页。

③ 同上书，第739—740页。

④ 在《胡适留学日记·自序》中胡适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奋读尽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⑤ 1914年7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他和朋友们发起一个读书会，要求会员每周最少读英文文学书一部，周末相聚讨论一次，会员是任鸿隽、梅光迪、张耘、郭荫棠和胡适。

部”文学股所写的年会论文《如何可使吾国言文言易于教授》中，胡适已经断言：汉文（即文言）是半死的文字，非日用语言。不过，当时他还比较谨慎，没提出用白话代替文言，而是认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可以通过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之容易教授就好。与朋友们的乱谈使胡适进一步认识到，白话可以取代言文。从小通过父亲的《学为人诗》而接受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胡适，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又通过师从杜威接受了实验主义哲学，这一中一西的哲学理念都促使胡适在面对朋友们的反对时，意识到自己以身作则的重要性。这年9月，他给梅光迪、杨杏佛、任鸿隽的赠别诗就是用白话所写，诗中不仅谈友谊，还将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也写了进去。因为梅光迪是热情支持胡适转学文科的朋友，他曾期望胡适“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①，所以在送梅光迪的诗中，胡适很热情地号召朋友：“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在答任鸿隽之诗中胡适直接写道：“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遗憾的是，胡适的热情召唤并未引起朋友们的共鸣，非但没有共鸣，反倒引起新一轮的争辩。梅光迪对其“作诗如作文”说尤不以为然。他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于诗，即谓之改良，谓之革命，则不可也。”因此，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任鸿隽的来信也赞同梅光迪的看法。朋友们反对的声音促使胡适仔细思索，他发现，梅光迪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并不是说将“文之文字”入诗就算是诗界革命了，“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论诗之一法”。因此在1916年2月写给梅光迪的信中，胡适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敝也。”后来，胡适谈到旧文学的弊端时，基本上就沿用了此信中的说法，他提出的“不避文之文字入诗”乃至用白话写诗，其目的就是要根除传统诗词中陈陈相袭的陈腐面貌，这对传统读

^① 沈卫威：《回眸“学衡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书人来说，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梅光迪就一针见血地说，“足下以俗字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谄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梅光迪站在传统诗教的立场上，断定诗歌乃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专用品，所谓匹夫匹妇的俚俗之言，即使会取得奇特化效果，也绝不能进入诗歌艺术的高雅殿堂。这的确是过去文学史展示给我们最常见的景观。至少从《诗经》的时代起，士大夫阶层所做的堂皇典雅的颂诗与雅诗无论在其产生的当世还是在后代都占据了显赫的地位。从那时起，无数文人士大夫苦心经营代代相传才留下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古典诗歌。梅光迪不轻言对古典诗歌的革命，认为诗歌究竟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利，这的确道出了诗歌的部分真相。诗歌毕竟是一门艺术，需要有相关艺术修养的人精心琢磨，才会有艺术的革新。只是，与上述情况同时并存的是，《诗经》也收录了无数细民百姓记录自己生活和情感的诗歌。不仅如此，事实上，历朝历代的无名艺术家们一直源源不断地在诗歌中抒发他们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由于个人才情及生活环境的关系，他们个人独创的作品或许数量并不多，但所有无名艺术家的创作总量定然是相当可观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幸流传至今的不多而已。正是基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同样悠久的历史传统，胡适把民间作为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梅光迪倒也认同这一大前提，但他不认同胡适由此延伸出的将老百姓的俗字俗语采用到诗歌中的推论，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者特有的守成性。事实上，梅光迪这么一个朋友的存在确实也让胡适受益匪浅。上面提及的胡适将“作诗如作文”改成“不避俗字俗语”就是一例。当然，这是建立在朋友间心平气和的讨论之上，若干年后，当梅光迪参与到《学衡》杂志，试图和一帮志同道合者与胡适再决一高低时，由于事实上白话文主张已被教育部采纳，在全国的中小学教育中全面推行的关系，梅光迪及其同道们的心态已经无法平静，《学衡》上发表的反对胡适文学理论的文章大都失去平等讨论的气量，胡适只字不应态度，与初期的时有修正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与朋友们的讨论中得到启发外，胡适还时时反观中国文学史，从中寻求支持。果然，他很快就发现，“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

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不独韵文如此，散文从古至今也有过多次革命^①。追本溯源，为自己的主张找出千年的历史，符合国人遇事向后看的思维定势，减轻反对的阻力的同时，也产生“吾道不孤”之感；胡适还多次给朋友们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英国的文学之所以繁荣就在于它们废除了已僵死的拉丁文，而采用各国自己的活的民族语言。师法外国成功的先例，是当时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国人的普遍心态，胡适也不例外；他说服朋友们的第三个道理，就是反复引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儒家的经典名言，暗示改良文学的工具文言乃是合情合理之事。

除了正面讲述必须进行文学革命的种种理由，胡适也在反复思索旧文学的种种弊端。他在1916年4月1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②与前已提及的2月份他给梅光迪的信中相对照，不难发现，对“言之无物”的抨击是一以贯之的，两信的主张相加就是后来《文学改良刍议》中八条主张中的五条，可以说，胡适对于改革旧文学的意见已经基本定型。不久，在最后写定的《沁园春·誓诗》中，胡适就用“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褰旗作健儿”，这样豪情万丈的语言，表达出他想做弄潮儿引领一场文学革命的决心。

三

1916年6月，胡适又有机会在绮色佳和任鸿隽、杨杏佛、唐肇黄等朋友相聚，文学问题是他们之间免不了的话题。与前次相聚不同的是，此时的胡适已认定了改良中国文学的根本途径在于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他反复向朋友阐明，白话不仅不鄙俗，而且优美适用；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文言未必及得上；白话不仅不是文言的退化，而且是文言的进化；白话也可以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今日所需要的，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语言，文言绝不能担当此任，只有白话才能胜任^③。他的反复宣讲还真取得了效果：任叔永打算用白话作科学社年会的演说

① 《胡适留学日记》(3)，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62—867页。

② 同上书，第893页。

③ 《胡适留学日记》(4)，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39—940页。

稿，梅光迪的文学革命纲领更是折射着胡适主张的影子^①。更重要的是，胡适明确提出新文学的使命，那就是：“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文学不当于人事全无关系”，因为“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也”。^②与来美之初的设想相比，胡适已经对于既要求文学作品有关乎世道人心的文学内容，又兼备美的艺术形式的“两美”的标准有所变化了，重点开始向其中的一方面倾斜，也就是说，他开始强调文学发挥教化功能的一面。当然，这种倾斜起初还不十分明显，因为胡适为这种新文学树立的典范，是易卜生的戏剧等确乎既有丰富的内容又在艺术形式上有一定造诣的作品——正是他融合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于一炉的具体体现。

胡适把文学的最终目的与改造中国社会的宏大目标挂钩的设计思路，其实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必然产物。来美国后，胡适深入体验美国生活，广泛地与美国各阶层民众交流，积极参与美式民主的种种活动，还选修政治课来指导和提升他对美式民主的认识，这些体验和认识促使他思考中国问题，在日记中，他对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变民国为家天下的倒行逆施多次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辛辣的讽刺。反复思索后，胡适最终的结论是：“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力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世界始可谓进化，而吾国始能真享和平之福耳。”而用白话写作一切文章，自然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对于当初一提笔就想不做与世道人心无关的文字的胡适来说，将文学的目标定在教育普通民众上，也是顺理成章

① 梅光迪的纲领如下：“一曰摈去通用陈言套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其一、三两条可以说与胡适主张无太大区别，其第四条显然是对胡适主张的修正。而梅光迪本人最看重的第二条在胡适的眼里则属于“似是而非”之论。胡适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梅光迪所要复活的古字实际上确实在现代社会中无法复活。在梅光迪眼里，古人称无草木之山为峒，有草木之山者为峽，小山与大山相并而小山高过大山者叫峒，这在梅光迪看来是知道字的精微区别的表现，“而后人以失学与懒惰故，乃皆不之知，而以少许之字随便乱用。后人头脑之粗简可知。故吾人须增加字数，将一切好古字皆起死回生。”其实梅光迪所谓古人的精微乃是其抽象能力欠佳的缘故，后人抽象能力大增，故不需要古人那样将一类事物还细分，将这样的古字看作是要复活的字，在现实中无疑很难实施。

② 《胡适留学日记》（4），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56页。

的事。这主张一经提出，有人就意识到了其缺陷。梅光迪攻击，这实在称得上是 Utilitarian（功利主义）之举，不过是偷得 Tolstoi（托尔斯泰）的余绪，而托氏学说是已被弃置不用的 19 世纪的旧学说。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产生了，最初梅光迪得知胡适要以白话写诗的主张时，攻击是从欧美新潮流中捡拾余唾，现在面对胡适文学主张的根本出发点时，又说俄国文学中过时的旧学说启发了对方。来自反对者的驳杂理论攻击武器，正好侧面反映出胡适的主张是针对中国现状，综合中西文学中可以为其所用的养分而形成的事实。只是，胡适已经胸有成竹，对此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 Utilitarian，其为 Tolstoian 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处，不必问其为 Utilitarian 抑为 Tolstoian 也。”^① 这样的坦然面对，只说明一点，即胡适坚决认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没有错，不在乎论争对手再给自己扣上师法国外的帽子。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从萌芽到逐渐定型，乃至亲自做白话诗以验证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都有实验主义的哲学作后盾。而梅光迪所信奉的人文主义更强调古老的人文主义传统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救赎，实验主义正是新人文主义批判的对象之一，因此，两个哲学和文化价值取向迥异的学派的中国弟子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上提出不同的方案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在胡适的眼里，他的朋友兼论争对手梅光迪也有自身的弱点，在 1916 年 7 月 13 日的日记中，胡适就说，“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如此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相比之下，胡适自信自己的理论是既有现实依据，又有中外文学史上可资借鉴的成例作后盾，故而对梅光迪的反驳已不十分在意。

总体上确定文学须关乎世道人心，普及大多数国人的原则之后，胡适将前一时期的新文学的见解加以总结，在这年 8 月 19 日给朱经农的信中，他提出新文学的要点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

^① 《胡适留学日记》（4），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955—956 页。

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① 这八条内容与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条相比，内容基本一致，只是顺序有别。

胡适留学日记基本上记载了他的思想状况，也摘记了大量外国报刊文章，包括有关文学的资料，若是节录他人文章，他都注明出处。然而察其日记中“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这条，我们看到，在用英文摘录了《纽约时报书评》中有关印象派之主张后，胡适写道：“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② 可见，胡适见到印象派理论时，只觉得自己有更多异国同道，并无明显表示自己受启发的意思。从这条日记所处的位置，可以断定它写于1917年1月份，其时胡适已写定《文学改良刍议》并送报馆发表，故胡适理论源于意象派之说难以成立。正因为胡适理论为自己思考的结果，所以他曾断然驳斥梅光迪说自己是拾西洋文学中之不值钱的新潮流来哄国人的说法，在胡适看来，首先梅光迪所贬抑的新潮流本身，“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门外汉所能肆口诋毁者也”；而且对方视新潮流为不祥的态度，实在是“人间之大不祥”。信奉“知行合一”学说和实验主义哲学的胡适，“最恨‘耳食’之谈”^③。作为老朋友的梅光迪，其实是从胡适到美国后积极融入美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积极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新潮流的态度上推断出胡适是有意吸收新潮流的结论的^④，他后来在《学衡》上发表的文章虽指明意象派是胡适所撷拾的西人余唾之一，但也混杂了对许多与意象派不相干的其他西方新潮流的抨击。其他指实胡适受意象派论影响的人，情形却有些复杂。他们没有梅光迪当初与胡适切磋的便利，即便是有所交往，已经是胡适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广为传播之后，他们之间未必有机会细话当年，而记录胡适此段思想发展线索的《胡适留学日记》一直要到20世纪40年代才出版，因此，他们仅仅根据文本貌似做一些推断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中，朱自清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者文人意气因素是可以肯定的，而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是当年与创造社关系紧密的文学后进，对胡适占据文坛显赫位置的不满，大概是其言论的主要动因。更后来断言胡适因袭意象派者，无论其身处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都没有静心细读胡适日记的工夫，偶有读过的，居然能够挖

① 《胡适留学日记》(4)，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002—1003页。

② 同上书，第1073页。

③ 同上书，第981—995页。

④ 旷新年：《胡适与意象派》，《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25期。